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4.004

# 《玉台新咏》编撰者新考

叶薇<sup>1</sup>, 叶桂桐<sup>2</sup>

(1. 潍坊学院 图书馆, 山东 潍坊 261061; 2. 鲁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经典《玉台新咏》的编撰者为徐陵,自唐以来似乎已成定论。21世纪初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史专家章培恒先生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玉台新咏》实为张丽华所“撰录”(编撰)。这一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玉台新咏》的“编辑”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参与,《玉台新咏》的“编辑”是集体合作的成果。《玉台新咏》的编辑者是徐陵,“丽人”是“撰录”者,“高楼红粉”是校对者。《玉台新咏》除了《玉台新咏序》之外,还有“小序”,即编撰者为诗集中的个别诗篇所加的序言。“小序”乃是考证《玉台新咏》编撰人的重要“内证”。

**关键词:**《玉台新咏》;编辑过程;徐陵;“丽人”;“高楼红粉”;“小序”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4-0021-05

《玉台新咏》<sup>[1]</sup>是南朝时期编选的诗歌总集,成书年代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和太清二年(548年)等说。全书选录诗歌769首,共10卷,其中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古绝1卷。除卷九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其余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也是六朝仅存的两部诗集之一。对保存汉至梁的诗歌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古代最为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以及女诗人班婕妤、鲍令暉、刘令娴的作品都是如此。另外此书的作品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崇尚唯美的文学风气,对于后人研究传统叙事诗的成就、理清乐府诗发展的脉络、探究唐代诗坛盛行五绝的远因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自唐人在《隋书》以及《艺文类聚》中认定徐陵为《玉台新咏》的编者,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异词。《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刊载了章培恒先生的文章《〈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sup>[2]</sup>(以下简称“章文”),考证《玉台新咏》实为张丽

华所“撰录”(编撰)。这一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议论纷纷,各有所见,经久不息。我们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玉台新咏》编辑者的认知问题,而且自章培恒先生开始,就已经自觉地把对著名经典《玉台新咏》编辑者考证与中国文学实证研究联系在一起,事关学术方法问题,有必要认真对待。

## 一、章培恒先生的新贡献

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一文中,章培恒先生通过对《玉台新咏序》的解读,认为“徐陵此序实已明确地宣告了《玉台新咏》是一位美丽非凡、风流婉约、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并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为排解寂寞而编的‘艳歌’集”<sup>[2]</sup>。在此基础上章培恒先生进一步考证这位妃子就是陈后主的爱妃张丽华。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玉台新咏序》关于《玉台新咏》编辑过程的叙述:

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宫宛转,柘观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矚,谁

收稿日期:2024-02-07

基金项目: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左名家李澄中与江南名士陈维崧交游考论”(X202311067309)

作者简介:叶薇(1972—),山东莱州人,潍坊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叶桂桐(1945—),男,山东莱州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能理曲。优游少託,寂寞多闲。无怡神于暇景,唯属意于新诗。可得代彼皋苏,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与雅颂,亦靡溢于风,涇为水之间,若斯而已。于是,人丽以金箱,装之宝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灵飞太甲,高擅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sup>[1]10</sup>

单从这里关于《玉台新咏》“撰录”过程的叙述“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来看,“撰录”者(主语)可以是《玉台新咏序》的作者徐陵,也可以是《序》中所描写的“丽人”。但如果从上下文的语气之连贯而言,则“撰录”者(主语)当为“丽人”。而且所谓“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云云,显然是在盛赞该书之书法之美妙,若“撰录”者为徐陵,这岂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似乎与情理不合。正因为如此,所以笔者认为章培恒先生之解读,即《玉台新咏序》中说该书的“撰录”者为“丽人”,是正确的。这正是章培恒先生的新贡献之一。

但我们认为章培恒先生的新贡献中最突出最有价值的东西还远不只如此,而在于章培恒先生的新考证,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界关于《玉台新咏》“编辑”的大讨论,令人确信《玉台新咏》的“编辑”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可以划分为分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参与,《玉台新咏》的“编辑”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玉台新咏》的“编辑”过程,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收集材料,选择确定入选篇目,制定各篇目排列顺序的原则,排列出入选篇目的顺序,撰写出一些篇目的小序,对全书进行校对,找“丽人”中书法水平最高的人、用当时质量最好的纸墨笔砚予以抄录,采用最精美的装帧。这一切,在《玉台新咏序》中都叙述得非常清楚。而深刻了解这全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全书,大有益处。准此,则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对于目前学术界在大讨论过程使用的一些关键性术语,进行辨析并达成共识。这里主要辨析“撰录”与“序”。

## 二、如何理解“撰录”和“序”

我们认为,首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撰录”这两个字?《辞源》释“撰录”为“收集著录”,这里的“著录”者亦为“丽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收集”者是谁呢?“丽人”“著录”的地点在“丽人”(妃子)的住所也是毫无疑问的,但“著录”的原始资料(“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却“分诸麟阁,散在鸿都”。那么又是谁将这些“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从“麟阁”“鸿都”拿到“丽人”的住所的?而且这些“往世名篇,当今巧制”是“分诸麟阁,散在鸿都”,并不是集中放在一处,一起拿过来就行了,显然是经过“选择”(收集)才拿过来的。那么这个“选择”者(收集者)又是谁呢?徐陵在《序》里没有明确的交代。徐陵之所以“没有明确的交代”,那是他以为没有这个必要:《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据詹锳考证约在梁大同五六年间<sup>[3]13</sup>,此时徐陵为“东宫抄撰学士”,而“丽人”虽然身为“妃子”,但她恐怕没有这种随便出入“麟阁”“鸿都”的条件,况且,徐陵既然能为《玉台新咏》作序,那么让他从“麟阁”“鸿都”“选择”(收集)这些诗歌,也正在情理之中。当然《玉台新咏序》中所说的这个“撰录”之“撰”即“选择”,“丽人”在“著录”时未必没有进一步进行过,但毫无疑问,这里的“撰录”显然重在“录”。

“序”与“叙”同。自从汉刘向校书以来,开创了编校书籍的新体例,“序”(“叙”)不仅作名词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即书《序》;而且可以作动词用,即编校书籍。“序”(“叙”)的这两种用法在徐陵生活的南北朝时期亦如此,而且历唐宋至明清一直有所承袭。这里只想说明两点:第一,徐陵是按当时人们对于“序”的理解来编校书籍和写作序言的,即为书写序与编校书籍是一回事;在徐陵的时代人们不会发生如同章培恒先生那样的理解,即写序与编校书籍无关,写序与编校书籍是两件事。因此也就用不着另作说明。第二,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丽人”“撰录艳歌”,这里的“撰录”一词使用准确,虽然“丽人”以“著录”(抄录)为主,但也作过选择,“撰”就有“选择”之意;这里也不排除徐陵有对于“丽人”的尊重之意。

## 三、徐妃比张丽华“撰录”《玉台新咏》的可能性更大

章培恒认为《玉台新咏序》中所描写的“丽

人”即陈后主的爱妃张丽华。2005年《文学评论》第2期又刊载了胡大雷先生的《〈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撰录”考》(以下简称“胡文”)[41]。胡大雷先生在该文中认为“《玉台新咏序》所描摹的‘丽人’风姿与张丽华的生平多有不相符之处”。我们是赞同胡大雷的这一说法的,并且还可以再作如下补充论证。

徐陵对于张丽华的赞美歌颂是竭尽全力毫无顾忌的,这在《玉台新咏》卷九所收录的徐陵《杂曲》(“宋刻不收”)中显示得非常清楚:

倾城得意已无俦,洞房连阁未消愁。  
宫中本造鸳鸯殿,为谁新起凤凰楼。绿  
黛红颜两相发,千娇百念情无歇。舞衫  
迴袖向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碧玉宫  
妓自翩妍,绛树新声自可怜。张星旧在  
天河上,从来张姓本连天。[1]467

连“张星旧在天河上,从来张姓本连天”都可以说出,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玉台新咏序》中所摹写的“丽人”为张丽华,那么徐陵完全可以说出她的尊姓大名,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

詹镛考证《玉台新咏序》中的“丽人”即梁元帝徐妃,是很有道理的。胡大雷从其师詹镛先生“称《玉台新咏》是徐陵为梁元帝徐妃解忧而作”的基础上,进而推论徐妃即《玉台新咏》之“撰录”者,但他认为徐妃即徐瑗,虽然有“瑗”与“昭佩”关系之考证,但似乎证据还不够充分。若徐妃即徐瑗,那么《南史·后妃传》为何只云“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郟人也”,而不叙出其名呢?

#### 四、“小序”是考证《玉台新咏》编撰人的重要“内证”

笔者以为要考证《玉台新咏》的编撰人,要充分运用两方面的材料,一是《玉台新咏》之外的有关文献,一是《玉台新咏》本身,前者可以称为“外证”,后者可以称为“内证”。“内证”除了《玉台新咏序》,还有“小序”,即编撰者为诗集中的个别诗篇所加的序言。

这在整体的方法论上,无疑是可行的,也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但对其中提出的某一个具体的证据,则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必然的,也清醒地意识到,要想从文献本身的角度拿出确凿的证据,还比较困难,我们只是可以做到如下的情况:从对原作品的内容与“小序的内容”的反复比较中,首先,判断所有的“小序”

是否都出于徐陵之手。如果有的可能不是,则从逻辑上说,就可以断定《玉台新咏》的编辑并非完全出于徐陵之手。其次,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证该“小序”的作者谁。当然也只能做到这样的解释于情于理都“说得通”。从逻辑上说,如果做到这第一层意见:《玉台新咏》的编辑并非完全出于徐陵之手,就很有价值了。而这样做,首先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学习《玉台新咏》就很有意义了。

《玉台新咏》中共有十首诗歌有小序:第一卷:《李延年歌诗》《班婕妤怨诗》《秦嘉赠妇诗三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第二卷:《刘勋妻王宋杂诗二首》、石崇《王昭君辞一首》;第九卷《越人歌一首》《司马相如琴歌二首》《乌孙公主歌诗一首》《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其中,石崇《王昭君辞一首》,《文选》亦收录并有序,其不为《玉台新咏》编撰者所加明矣。《班婕妤怨诗》《文选》中收录,但无序,则该诗之序当为《玉台新咏》编撰者所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序言最后说:“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从序的语气看,显然不是原诗所有,而为《玉台新咏》编撰者所加。

“小序”文字不多,为免读者翻检之劳,且便于叙述、阅读,现照录如下:

《李延年歌诗》序云:

李延年知音,善歌舞,每为汉武帝作  
新歌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坐上,  
起舞,歌曰。[1]21-22

《班婕妤怨诗》序云:

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  
宫,乃作赋再机伤,并为怨诗一首。[1]26

《秦嘉赠妇诗三首》序云: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  
其妻徐淑,寝疾换家,不获面别,赠诗  
云尔。[1]30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言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  
刘氏,为焦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  
逼之,乃没水而死。焦仲卿闻之,亦自缢  
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1]43

《刘勋妻王宋杂诗二首》序云:

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  
二十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  
子出之。还于道中,作诗二首。[1]58

《越人歌》之《序》云:

楚鄂君子偕者,乘青翰之舟,张翠羽



之盖。榜棹越人悦之,棹楫而歌越歌,以感鄂君,欢然举绣被而覆之。<sup>[1]388</sup>

《越人歌》之《序》云:

刘向《说苑》云:“楚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钟鼓之音毕,榜棹越人拥楫而歌。于是鄂君乃揄修袂,行而拥之,欢然举绣被而覆之。鄂君,楚王母弟也。”<sup>[1]388</sup>

《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序云:

司马相如游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于壁间窥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sup>[1]389</sup>

《乌孙公主歌诗一首》序云:

汉武帝封中,以江都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弥。至国,而自治室宫,岁时一再会,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sup>[1]390</sup>

《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序云:

汉成帝赵皇后名飞燕,宠幸冠于后宫,常从帝出入。时富平侯张放亦称佞幸,为期门之游。故歌云“张公子时相见”也。飞燕娇妒,成帝无子,故云“啄王孙”,华而不实。王莽自云代汉直德土,色尚黄,故云“黄雀”。飞燕竟以废死,故“为人所怜”者也。<sup>[1]391</sup>

综观《玉台新咏》编撰者所加的这九篇“小序”,从原诗的内容上来看,《李延年歌诗》《班婕妤怨诗》《乌孙公主歌诗一首》《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四首“小序”都与“妃子”有关;其余五首除了《越人歌》情况比较特殊之外,都是哀婉动人情真意切的爱情故事。

笔者以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越人歌》当为《玉台新咏》的收集人即徐陵所加,这是在从“麟阁”“鸿都”抄录时就加上去的,理由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署名“无名氏”,也很难确切地考知写作的时间(“小序”虽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但未必就是汉末人),但原诗中关于这个故事或许有相关的说明文字,“小序”当就是根据这些说明材料而加上去的。《越人歌》来源于刘向《说苑》,其“小序”亦然,“丽人”案头未必一定有这样的书。

《李延年歌诗》《班婕妤怨诗》《乌孙公主歌诗一首》《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四篇诗作和“小序”都与《汉书》有关,若为《玉台新咏》“收集人”徐

陵所加,那么其中显然寓有风规之意,但从《玉台新咏序》来看,徐陵并无此意,因此这四篇“小序”可能为《玉台新咏》的“撰录”者“丽人”所加,是借“小序”来抒写自己的感受,她与原诗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份相同,正所谓“物伤其类”或“同病相怜”者也。

又《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与《汉书》相校,无“皇孙死,燕啄矢”和“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四句。这四句与飞燕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皇孙死,燕啄矢”紧承“燕飞来,啄皇孙”两句。“矢”即“屎”,“屎”与“死”音近,北方方言有歇后语云:“打着灯笼拾粪——找屎(谐“死”)。”所谓“皇孙死,燕啄矢”即“皇孙死后,燕也死了”。“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亦与飞燕之死有关。飞燕之死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被株连,但也与“谗口乱善人”有关。《玉台新咏》漏掉了这四句,就使“小序”中的“飞燕竟以废死”没有了着落。《玉台新咏》之编辑者或许除《汉书》之外另有底本,但其“撰录”人、校对者手中显然没有《汉书》则由此可以得到证明。由此亦可证《玉台新咏》的“撰录”者“丽人”并不具备收集集子中所收录的诗歌的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能力或条件,所以“撰录”者并非就是“丽人”。总之,从《玉台新咏》的“大序”“小序”来看,《玉台新咏》的编辑者当为徐陵,“丽人”也可能作过“选择”,甚至为个别诗篇加过“小序”。

## 五、关于“高楼红粉”

“章文”说:“第七段说,这十卷书装帧极为精美,字也工妙,而且由她自己作过校正(‘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sup>[2]</sup>这是说“丽人”同时又是《玉台新咏》的校对者。我们认为“仍定鲁鱼之文”之“仍”非“依然”之意,其意为“乃”。“仍”固然有“依然”之意,但亦可以释为“乃”。《尔雅·释诂》云:“仍,乃也。”这里的关键乃是“高楼红粉”到底是指谁。

我们以为这里的“高楼红粉”不是指“丽人”,而是与“丽人”对举的那些人。《玉台新咏序》在开头就将“丽人”与宫中其他女子对举,意在通过对比显示“丽人”之“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这些与“丽人”对举的女子是:“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sup>[1]13</sup>这正是典型的“高楼红粉”。或云把这些“高楼红粉”说成是

“仍定鲁鱼之文”之人,岂不是会贬低“丽人”吗?回答刚好相反。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是有意将“丽人”与这些“高楼红粉”对比的,这正是所谓“烘托”法。水涨才能船高,“高楼红粉”的水平愈高,方显示“丽人”之倾城倾国。而且,“丽人”的“撰录艳歌”虽然旨在解忧,但却并非是独自一个人吟唱诵读,而是与“高楼红粉”同乐,所谓“长循环于纤手”是也。如果这些“高楼红粉”连“鲁鱼”都不能定,哪里还谈得上同乐?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徐陵的《玉台新咏序》虽然用的是夸张的骈体,但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辑、撰录与校对过程的叙述是真实的、明确的。《玉台新咏》最初是他从“麟阁”“鸿都”收集而来的,并且不是散乱的,而是编辑过的,即有序次的。

“丽人”是“撰录”者,虽然以著录(抄录)为主,但也作过“选择”,甚至可能为个别诗篇加过“小序”;这个“丽人”有可能就是梁元帝的徐妃,但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最后由“高楼红粉”(即其他宫女)作过校对。

#### 参考文献:

- [1] 吴兆宜. 玉台新咏笺注[M]. 穆克宏,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章培恒.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J]. 文学评论, 2004(2).
- [3] 詹锳. 《玉台新咏》三论[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 [4] 胡大雷. 《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撰录”考[J]. 文学评论, 2005(2).

## New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Compilers of *Yutai Xinyong*

YE Wei<sup>1</sup>, YE Guitong<sup>2</sup>

(1. Library,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261061,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classic *Yutai Xinyong*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s compiled by Xu Ling, which has been taken as the final conclusion ever since the Tang Dynasty.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Zhang Peiheng, a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expert, put forward the new viewpoint that *Yutai Xinyong* was “compiled” by Zhang Lihua, which has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opinions have varied.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Yutai Xinyong*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it is even called a huge projec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phases, and in each of them different compilers participate. The “compilation” of *Yutai Xinyong* is thus the achievement of collective work. The compiler of *Yutai Xinyong* is Xu Ling, “Liren” is its “writer and compiler”, and “Gaolou Hongfen” is its proofreader. Besides Preface to *Yutai Xinyong*, there is also “preface to one poem”, namely the added preface to one poem in the collection by the compilers. “Preface to one poem” is the important “inner proof” of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compilers.

**Key words:** *Yutai Xinyong*; compiling process; Xu Ling; “Liren”; “Gaolou Hongfen”; “preface to one poem”

(责任编辑 陇 右)